

尼克松回忆录

(摘要)

一九七八年六月翻印

出 版 说 明

《尼克松回忆录》已于五月出版。美国《纽约时报》属下之《特稿出版社》独家发行该书的摘要，并从四月三十日起在世界各地的七十家大报上同时发表。本书是根据香港《星岛日报》的译稿翻印的，书中仅有关人名、地名按照我国习惯译法作了校正，特此说明。

目 录

第一章	水门事件	1
第二章	辞职	27
第三章	越南	38
第四章	中国	60
第五章	高峰会议	71
第六章	戴高乐	85
第七章	中东	95
第八章	拉丁美洲	107
第九章	人物	117
第十章	我家	128

第一章 水门事件

我最初踏上引退之路而终至结束我的总统职务，是一九七二年六月底与七月初之事。

六月十六日，星期五，我前往佛罗里达州渡周末。我是一个人去的。我的太太帕特正在西海岸为我进行竞选活动，女儿们则跟她们的丈夫在一起。我的公事包里放着一份竞选备忘录，还有关于福利改革的说明资料和本我读了多遍的书，书名是《关于美国的民主观念》，作者为艾文·克里斯托尔。我还带了一本《胜利与悲剧》，这是邱吉尔手著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最后一卷。我带这本书，是因为最近同苏联举行了高峰会议的第一回合后，我想再读一下邱氏对于雅尔达会议的分析。

星期五下午和星期六整天，我都在大凯岛。这是巴哈玛群岛中的一个小岛，是我的老朋友波普·阿巴拉纳尔普的私产。

六月十八日，星期六上午，我的朋友华比·李波索同我离开这里去佛罗里达的比斯凯恩角。我一踏入自己的居所，就闻到厨房里飘出煮咖啡的香

味，当即进去要了一杯。台上放着一份《迈阿密先驱报》，我打开第一版晃了几眼。

第一版正中的左侧有一段小新闻，标题是《迈阿密人在华盛顿被拘。企图在民主党总部装窃听器》。

有五个人在水门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里被捕，其中四个是从迈阿密去的。水门大厅在华盛顿，里面有酒店、写字间和公寓。新闻里说五人之中，有一个自称以前是中央情报局的职员；另三个是古巴人。他们全戴着外科手术医生所用的橡胶手套。这段新闻看来荒谬得很：古巴人戴着橡胶的医用手套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装窃听器！我当时认为它是开玩笑，未予注意。我把报纸放在台上，跟着打了几个电话。

接着，我在海上游泳了好久。

当晚我决定早点休息。上床之前，我坐在书房里读《胜利与悲剧》一书的最后几章。

星期一的天气好，终日阳光普照，微风徐来。我没有想起要读早报，而迳入书房打电话。脑子里根本没想到水门被人闯入的那回事。

我忙了一个上午。午后乘船出游，晚餐之前，还散步了许久。晚上七时四十八分，我登上《空军

一号》专机飞回华盛顿。

当天深夜，我补写了几段日记。日记里写着周末的气候预测和松弛身心的一般好处的心得，间中有一段关于水门的记载。

日 记

归途中，接到幕僚长鲍伯·霍尔德曼一段烦人的报告，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被潜入一事牵涉到“支持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某职员。委员会的主席亦即前检察长约翰·米切尔在电话里神秘地告诉鲍伯别卷入此案，我则对鲍伯说我只希望我们的人员没有一个跟此事有关，理由有二：第一，因为干这种事至为愚蠢；第二，因为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企图在全国委员会里装窃听器。

那个在水门大厦被捕的“支持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以下简称“竞选连任委员会”——译按）职员叫詹姆斯·麦科德。他以前是中央情报局的保安员，“竞选连任委员会”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都聘他为安全顾问。霍尔德曼又听人说，从那几个被捕者身上搜出的款项——是现款，数目在一千元以上——似乎是“竞选连任委员会”给的。

由于麦科德和“竞选连任委员会”的关系，他的被捕遂使水门事件变成热门新闻。

古巴人戴上橡皮手套在民主党总部装窃听器的说法，在星期六早晨看起来非常可笑。可是到了星期一晚上，它已变成总统竞选的一个潜在的论争点。

六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华盛顿邮报》刊出消息，说在民主党总部被捕的人，有两个随身携带的亲友地址录中，出现了霍华特·亨特的名字。据说直到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为止，这位前中央情报局情报员亨特曾在白宫任职，是查尔斯·科尔森手下的参议。科尔森是我的核心随员与核心顾问的一员，假若他被牵涉进去，形势就大变了。

我对科尔森说，根据我的了解，我们正准备把水门事件只谈到其现在的阶段为止，也就是同古巴人有关的那段。

科尔森又提到亨特之事。他说被捕者的亲友地址录上出现亨特的名字，是世间上最合理之事。早报已经指出亨特曾经当了中央情报局情报员二十年以上，而此次被捕的人，全跟中央情报局有关系。不过科尔森对我说，还有深一层的关连：亨特曾经训练古巴的放逐分子参加猪湾之役。科尔森所得的这项资料，似乎又加强了此案与古巴的关系。

六月二十日，我同霍尔德曼两度会谈，一次是由上午十一时二十六分起至午后十二时四十五分止，第二次是午后四时三十五分起至五时二十五分止。上午的那次谈话，外界将永难知其全貌，因为谈话的录音带，有十八分半钟空白。我们在那十八分半钟空白谈了什么，可以从霍尔德曼写下的笔记里窥见一斑。据笔记所录，我对于水门窃听事件的最初反应是下令我的行政大厦里各办公室应该经常有人检查，以确保没人在我这里装置窃听器。

上午谈话可能涉及水门窃听事件最明显的征象就是这次谈话之后才几个小时，我们在当天下午又讨论到同一问题。午后的谈话内容是：我们自己的人，不管属于那个官阶，是否曾经把我们卷入这个尴尬的局面；还有，一切调查与口供，假若从每一可查的角度作过分的追究，是否会让民主党据为竞选的主要课题。

我觉得从古巴角度去说明水门窃听事件，可以对我们有两点好处：第一，可以保我们不会因为“竞选连任委员会”卷入一事之外泄而使我们遭受政治上的冲击；第二，可以促请外界注意美国国内的古巴侨民都害怕民主党参议员乔治·麦戈文一向对古巴首领卡斯特罗取天真政策，从而狠狠打击民主

党。

六月二十日是忙碌的一天。就水门事件而论，我当晚步行回官邸时，心里充满信心。我当初最担心的是怕有白宫的人被牵涉到，但霍尔德曼和科尔森已经就这一点请我放心。霍尔德曼同样对我保证米切尔跟此事关系。有了这些保证，我准备采取攻势。

（原编者按：尼克松不久就知道水门案并不象他当初所想象的简单与易于控制。例如，他从霍尔德曼处获悉水门行动的主脑是戈登·利迪。这个人以前是白宫的职员，后来成为“竞选连任委员会”财政组的法律顾问。这时候联邦调查局看来有办法追究出水门窃听人物身上现款的来源，而最后则追究到“竞选连任委员会”。米切尔和白宫的年轻顾问约翰·迪恩想出了一个主意，要联邦调查局停止调查那笔钱的来源。）

据霍尔德曼说，中央情报局付局长维农·华尔斯将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巴特·格莱，“请他别管这件事。我们不要你作进一步的调查”。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早有互不干涉对方秘密

行动的协议。霍尔德曼说打这一次电话，并不出奇。他说格莱本想不作深入调查，只是于法无据；现在我们这样一来，可以使他有所依据。霍尔德曼说，这个办法可以行得通，因为从事调查此案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已经认定中央情报局多少与此案有关。

我对霍尔德曼说，我们觉得如果再深入调查而暗指此事与古巴人或亨特或与“这样那样阴谋有关，只是同我们自己无关”，情形就对我非常不利了。

我又对霍尔德曼说，我相信此事将揭开整个猪湾事件，我认为应请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前来，告诉他们为了国家设想，不应再对此案作进一步的调查。

霍尔德曼与韩姆斯和华尔德斯会谈后（译按：韩姆斯当时为中央情报局首脑），回来对我说，韩姆斯已明了全局，乐于帮忙。就我而论，我们对于水门事件已经再没有什么顾虑了。

不久，我可以觉得出来，外界对于白宫的怀疑仍然存在。不过我相信这只是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只须公共关系做得好，就可以消除。

到了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次年一月初，情形开始有变，尽管是微妙地变。水门案就快开审，各被告所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白宫已感到震动，尤其是亨特的情形麻烦，因为他已把太太

坠机丧生以后自己绝望心情告诉了科尔森。

外界开始普遍产生一种印象，以为此案的真相已被掩饰，到了二月间，我对于这种印象之存在，仍表焦虑，但毫无办法。尽管我们对于此案有种种疑测，我们实在不知道谁该负责，我也不准备徒为我个人解决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而强逼别人更改供词。不过，正如我对科尔森说的，“我们根本没有掩饰什么真相”，所以“因掩饰问题而让总统蒙受的损失，必须消除”，科尔森非常同意我的观点。

我在二月十四日口述的一段日记，总结了我个人在新年最初几星期所看到的形势。

日 记

科尔森的真正忧虑，是亨特有爆出来的可能。亨特似乎心里觉得他的太太是被自己害死，因为他当时要她带那笔钱到芝加哥去或替他干点别的工作。他不愿在她死后领取一笔二十五万元的人寿保险金，就是由于自己觉得有杀妻的内疚，鉴于这种形势，我可以料想得到。假若法官把亨特叫到面前，拿三十五年的刑期来恫吓他，他很可能为了免受刑罚而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全盘吐露。

我决定提名格莱真除联邦调查局局长一职。我向他保证，参议院审查提名时，不管说到有关水门案的什么话，我都不在乎。

格莱认为自己有把握说服别人相信联邦调查局在调查水门事件的时候，无所偏袒，他甚至有把握说服不相信的人，他自己当然是相信的。

接着，格莱以半天真半圆熟的立场，竟让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把这次的提名审查会变成不幸事件。他把联邦调查局的原始档案交给参院委员会公开发表。他每次列席审查会时，都使迪恩的名字越来越牵入此案。委员会里的民主党议员开始坚持迪恩必须先列席作证，才肯通过格莱的任命。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我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就涉及水门案和迪恩在此次调查中所处的地位。

我替迪恩辩护，指出总统的顾问如果接受一个国会小组委员会之召而列席作证，不但无此先例，亦属不可思议。迪恩不但享有行政首长的特权，而且受到历久不变的“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机密不可泄”原则的保护。

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上午十点钟甫过，迪恩踏入我的椭圆形办公室。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问题，其严重性已无庸置疑”，他说。“我们内部，也就是总统的左右，已得了日见成长的癌症。毒瘤逐日增长。”

事情似乎一天天变得更加复杂了。

迪恩告诉我，亨特和利迪曾经带着中央情报局的配备潜入心理治疗专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写字间。

“竟有这种事——”我说。

迪恩说他们两人干这种事，是想偷走埃尔斯伯格的医疗记录。这些记录与一批五角大楼文件有关。不过迪恩似乎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埃尔斯伯格曾经承认把那批五角大楼文件交给各报发表，现在他正以盗用文件罪受审。这批文件就是越南战争的秘史。）

（原编者按：迪恩说了上面的话后，又发表了一篇详细的报告，说出白宫和“竞选连任委员会”的几个闻名人物与水门窃听案的关连，以及事后的掩饰企图。他还透露总统的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曾受命筹款给那几个窃听分子，迪恩接下去尽是语惊四坐之言，说白宫的幕僚长霍尔德曼，总统的内务顾问约翰·埃利希曼，“竞选连任委员会”主席米切尔，以及他自己，都与此案有关。“这是

阻挠司法的举动”，迪恩说。接着，他谈到问题的核心：“竞选连任委员会”的一名律师亨特——就是从前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那个人的一封信，索取十二万二千元作为律师费与个人的费用。亨特还同时恫吓埃利希曼和埃氏的属员伊吉尔·克罗。据迪恩说，亨特指定交款的最后限期是“昨天交易所收盘的时间”。

亨特的恫吓是各被告可能不断提出勒索的大问题中最急迫最可注目的例子。我问亨特想要多少钱。迪恩估计在今后两年内，可能总共要付一百万元给各个被告。

我说这不容易办，但我知道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弄到这笔钱。

“光看迫在眉睫的问题，你难道不要赶紧处理亨特的财产问题吗？”我问，“你必须把瓶盖子盖紧到没有其他取舍余地——不是盖死，就是让它马上爆炸。”

“不错”，迪恩说。

还有亨特希望宽赦的问题，假若他存心想获得自由，光是金钱是不会令他满足的。

“我不敢说你一定有办法提出宽赦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太棘手了”，迪恩说。

“提出此事是不对的，这一点应无疑义，”我说，“不过，此时此刻，你难道不同意你最好是把亨特的问题妥为应付么？我的意思是说，此时此刻，这是值得一为的。”

“不错，值得去拖延一点时间”迪恩答。

当晚，我口述了当天的日记。从事后去看，这一天是我任期内一个悲惨的转折点。

回顾既往，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迪恩在三月二十一日那天，是想警惕我，让我明白九个月来我一直把谁是窃听案的主使人这一点当为水门事件的主要问题，而事实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不及新产生与远较严重的掩饰真相问题了。

三月三十一日，联邦地方法院法官约翰·赛里加开庭宣布水门案的判词。开庭前不久，有人交给他一封信，是麦科德写的。麦科德说自己曾受到政治压力，要他缄口勿语。麦科德又说自己在受审期间，曾发假誓，而且曾经有人表示可予宽赦，交换条件是他闭口不说话。赛里加把这封信在庭内当众宣读。

赛里加法官准麦科德保释。这位法官又暂判亨特入狱三十五年，其余四人暂判各入狱四十年。李迪曾以不肯开口而犯了蔑视法庭罪，现在获判入狱

六年八个月，另罚款四万元。这几项判决实属横蛮。华府地方法院过去对于杀人犯，还判得轻一点哩。赛里加承认判得重。但表示这是一种策略，目的是要各被告说真话，所以重判是有理的。

三月三十日，在我们前往圣克里门蒂（我在加州的寓所就在这里，这个寓所亦称为西部白宫）之前，我的新闻秘书隆·齐格勒对外宣布，假若水门案的大陪审团邀请白宫职员前往问话，职员一定全力合作。齐格勒又说正与欧文委员会（即参议院调查水门案的小组委员会）谈判关于我们勿坚持享有任何特权的问题。（原编者按：白宫曾经力争，说政府的行政部门人员不能被迫列席该委员会作证）。

四月十五日，星期天，在白宫的午后宗教礼拜仪式完成后，检察长理查德·克兰汀斯特进入我的办公室，说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正被卷入水门的刑事案。他说主要的原告是迪恩。

当天下午，检查长带了司法部的刑事厅厅长亨利·派德逊又来到我处。原来检察长寻到派德逊的时候，后者正在洗刷游艇，所以上身套着一件脏T衫，下身穿件牛仔裤，足登网球鞋，检查长就把他这样带进了白宫。

派德逊对我说，他认为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应

该辞职。他承认检举他们的证据并不十分有力，不过他补充一句：“他们已经使你处境尴尬，将来还要使你难堪，也使总统的职位难堪。”

后来，我把克兰汀斯特与派德逊跟我谈话的经过告诉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他们都呆了。

我从直觉上看出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势须离开白宫，我明白他们假若留下不走，可能对白宫有损，对我也有损。

我心里想，使两个人可能要负起刑责的那些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敢确定窃听案之发生，我事前并无所闻；根据窃听电话之所得而写的什么报告，我并没有看到；埃利希曼所称指示迪恩把一些得自亨特的保险箱的资料全部“埋葬”一节，我亦毫无所知。我敢确定没有人请求我吩咐坎巴枢筹款，也没有人同我谈过要动用三十五万现款基金交付给各被告之事，在三月二十一日那天，我甚至还想到要支付一笔勒索费哩。

不过有些事，我是知道的。我曾与科尔森谈到宽赦之事；我也曾怀疑杰甫·马格路德（竞选连任委员会的职员）没有说真话。但尽管怀疑，我却没有采取行动。我还知道有人把律师费和安家费送给各被告之事。我跟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不同处，